



中共第一屆「干部学习节」

□ 周文洋

1940年，延安军政干部在学习

大力倡导、高度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。井冈山时期，党组织就通过“思想训练、发放文告、群说众议”等方式，在革命队伍中开展政治素质、阶级觉悟、形势任务等学习活动。延安时期，毛泽东提出“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”，号召党员干部“笃学致读、与时俱进”，呈现出“吃小米饭，攻理论山”的浓烈学习氛围。

1939年2月，中共中央建立“干部教育部”，负责全党的政治理论学习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政府有关部门都设宣传科或学习室，担负组织、指导各级干部学习的任务。

1940年3月24日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》，规定每年5月5日为“干部学习节”，要求各单位在此期间总

结全年学习情况和经验，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。

同年5月5日，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中国共产党“第一届干部学习节”动员大会，军委主席毛泽东在讲话时说：“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、有战斗力的大党，就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，为此就非学习不可。”“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，一个是生产运动，一个是学习运动，都有普遍的、永久的意义。大家要把这两个运动进行到底。”

中宣部部长张闻天在会上强调：“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，弄清弄懂疑难的、有争议的问题，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。”

中组部部长陈云也提出：“为把握、领导革命运动，必须增加政治理论、历史知识的学习。共产党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，有的人知识却那么少，应该是‘加油’的时候了！”

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具体谈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体会，鼓励大家学习时要保证“眼到、心到、手到”，才能弄懂、记牢。

会上，表彰了陈云、张闻天等人领导的39个模范学习小组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被评为模范学员，他在讲话时谦虚地说：“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模范学员，老实讲，怕算不上。因为我小时候读了些‘诗云’‘子曰’很多要不得的东西，现在要重新学起，一面学新的，一面还要丢旧的，我要努力学习，时时刻刻前进。”

第一届“干部学习节”过后，延安的机

关、学校、部队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并逐步扩展，各根据地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全方位的学习运动蓬勃兴起。延安和各根据地相继创办“中央自然科学学院”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”“华北联合大学”“河北抗战学院”等10余所高等院校，构筑起更多的学习基地，培养出一大批知识丰富、德能兼备的革命人才。

1941、1942年，中央又连续举办了第二届“干部学习节”，在第二届“学习节”上成立了“中央学习委员会”，发起“调查研究、社会实践”运动，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社会，实地调查，学会在不同环境下，正确观察判断，制定决策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掌握在农村、城市和军政工作落实各项政策的方式方法。在第三届“学习节”期间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》，提出整风运动就是“学习运动”。毛泽东相继发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《反对党八股》等演讲，强调学习内容、观念的重要性，号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制度化、规范化长期保持，不断推进。

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举办的“第一届干部学习节”，是开展学习运动的伟大开端，是重视、勤于、不断学习的起点，也是学以致用、社会实践的创举，更是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，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、政治水平，在思想上、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也为夺取“抗战”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出重要作用，更为建设独立的、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大党铺就了宽阔坦途。

民国初革命报纸《大汉报》的创始人——胡石庵

□ 王贞虎

1911年10月，武昌首义的枪声，结束了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。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，反封建专制革命的第一张报纸——《大汉报》，应运而生。它的创办人是胡石庵。

胡石庵(1879—1926)，名人杰，别号天石。湖北天门人。早年参加兴中会，后加入同盟会。与詹大悲、海海鸣、孙尧卿等为刎颈之交。1910年，他卖掉全部家产经营印刷业，在汉口散生路(即今江汉路)开设一间印刷公司，刊行革命书籍。

首义伊始，武昌城内，百事待举，无暇顾及报刊宣传等工作。而汉口形势，更为纷乱。一天，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问胡石庵：“武昌之变，究竟属何等性质？”胡石庵毫不含糊地说：“革命党起义，光复汉族河山，推翻君主，建立民国。”英国人说：“恐怕不一定吧，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澂的照会说：武昌是土匪作乱，奸虏烧杀，抢夺钱财，无恶不作……既是革命党起事，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，使中外人士了然呢？”胡石庵回答：“你们不要相信那一套，那是瑞澂的恶毒中伤。一两天内，会有革命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现的。”

胡石庵深知，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，在革命紧要关头的重要性是不待言的。他决心利用自己拥有印刷工具的有利条件，早日把报纸办出来。回公司后，他召集工人，同大家商量创办报纸的事。此时公司里只有几台破旧的印刷机器。大家马上凑集了一点钱，买回几令纸，胡石庵一个人就自写自编、划版校对，在首义后的第五天(10月15日)，革命后的第一张报纸——《大汉报》诞生了。

在《大汉报》的创刊号上，头版头条就是一篇以“中华民国军政府”的名义，讨伐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檄文，而且还刊载了一些新闻和专电如：“黄州巡抚营独立”“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，并向武汉赴援”“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，援鄂之部队即日可到”“九江独立，敌下游军舰上驶均被截获”等等。三万份创刊号的报纸，被广大群众抢购一空。第二天，胡石庵收到以“大总统孙文”名义，写的一篇《告同胞书》的文稿，这在当时条件下，对稳定大局，扩大影响，鼓舞士气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如当报纸传到伦敦时，英国人士就认为这篇文告是孙中山先生预作的；大总统的名义也是人民预选的，于是纷纷向当时滞留英国的孙中山先生道贺。后来，汉口军政府成立，詹大悲从各方面大力支持胡石庵，才使《大汉报》成了一份名正言顺的革命报纸了。

胡石庵在主持《大汉报》期间，对报纸的各项工作，事必躬亲，经常到前线采访战况，工作极为认真。他在《大汉报》上发表诗文多篇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写的哀悼彭(楚藩)刘(复基)杨(宏胜)三烈士的七言绝句：“孝孺舌断血成碧，子胥头悬眼尚睁。革命木成遗恨在，江流呜咽作悲鸣！”读来哀婉沉痛，感人肺腑。

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，为笼络人心，设立了一个名为稽勋局的机构，对革命有功的人授奖，颁发勋位和嘉禾、文虎等勋章。胡石庵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后，他立即把它退回了“总统府”，并附上一首七言律诗：

三户亡秦愿已空，战场荒草渍残红。  
那蛇内外成虚斗，冀马奔腾起大风。  
一雁横飞秋色里，万花齐落鼓声中。  
乾坤正气消磨尽，狗尾羊头亦巨公！

这首诗对仗工稳，用典贴切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胡石庵爱憎分明的高尚情操。他不但将它寄给“总统府”，并在《大汉报》上刊发出来。后来黎元洪北上，袁党段芝贵督鄂时，《大汉报》就被查封了，胡石庵也锒铛入狱。后虽出狱，但因健康大损，终于1926年8月病逝，终年47岁。他的挚友、国民党元老居正，曾为其题赞曰：“公之别号，石可补天；公之才华，大笔如椽！”这是对他战斗一生的最好评价。

· 丝路文史 ·

□ 潘硕珍

见证明初洮岷历史的邓氏家谱



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新寨村“新寨庙”庙内横梁题记

二世祖邓钦(来祥公)所修“新寨庙”庙记，刻于横梁之上。文曰：“大明洪武八年，友德之后邓来祥以京师差遣之总兵镇守岷南，屯兵新寨口，为岷南兵镇造始也。同郭有福修新寨庙，神光普照，泽润四方之安祥。大明洪武八年吉日焚香记之大梁。”

新寨庙，又称铁丝娘娘庙，庙内供奉明初高皇后马氏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，邓汉公初步修订了《岷南邓氏宗谱》(手抄本)；2003年11月，邓崇等人开始重修邓氏族谱，2021年完成，改名《宁河堂邓氏来祥公房宗谱》(精装本)。

据该家谱记载：

一世祖(始祖)邓愈(1337—1377)，原名邓友德，字伯颜，泗州虹县(今安徽泗县)人，明朝开国名将。元至正十五年(1355年)，邓友德率所部万余人从盱眙前往滁州投奔朱元璋，任管军总管，朱元璋赐名邓愈。洪武二年，明太祖立功臣庙于南京市鸡鸣山(别名鸡笼山)，论功列祀21人，死者塑其像，生者虚其位。功臣庙正殿供奉岐阳王李文忠、宁河王邓愈、黔宁王沐英、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、东甌王汤和等六王的塑像或牌位。洪武三年(1370年)，邓愈跟随徐达、沐英等将领远征甘肃，击败北

元军队，招降吐蕃、乌斯藏诸部，晋封为荣禄大夫、右柱国，封宁国公。

洪武五年(1372年)，宋国公冯胜为了追击元朝残余势力，在兰州城西修建了一座浮桥。洪武九年(1376年)，卫国公将这座浮桥加长了3里，后世称这座桥为“镇远桥”。洪武十年(1377年)十一月初九日，邓愈病逝于安徽寿春，年四十一，追封为宁河王，谥武顺。邓愈由狄道进攻河州，修筑了宁河(今和政县)县城。和政县建有邓氏家族祠堂宁河堂(堂号取自邓愈的封号宁河王)。邓愈还被供奉为和政县的城隍爷。

邓愈的后裔分布在安徽、江苏、四川、甘肃、青海等省。邓愈夫人曹氏生子三：邓镇、邓铭、邓镛。汪氏夫人生子三：邓钦、邓铨、邓铨。徐氏夫人生子邓鑑。

二世祖(开基祖)来祥公(?——1390)，本名邓

钦，明开国元勋宁河武顺王邓愈第四子，原籍虹县(今安徽泗县)城南龙宿里。洪武三年，太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、汤和为副将军，分道北征，与扩廓帖木儿(本名王保保)战于车道峒(今定西车道岭)大破扩廓……邓愈邓钦等自临洮进克河州、洮州、岷州、贵德，追扩廓至西黄河，为保证征西大军和辎重通过夏河，在河州建桥一座，人称“邓钦桥”(后演变成邓家桥村落)。洪武六年(1373年)，邓钦以甘肃总兵之职镇守洮、岷、河、湟地区。邓钦在洮州、和政、贵德修筑边墙、城池，在岷州南部哈达铺镇修建新寨城堡(简称新寨)、新寨庙、山神庙和邓家水磨(以后在磨坊周围建起了民居，形成了邓家磨村落)。据新寨庙内横梁“题记”记载：“二世祖邓钦(来祥公)所修‘新寨庙’庙记，刻于横梁之上。文曰：‘大明洪武八年，友德之后邓来祥以京师差遣之总兵镇守岷南，屯兵新寨口，为岷南兵镇造始也。同郭有福修新寨庙，神光普照，泽润四方之安祥。大明洪武八年吉日焚香记之大梁。新寨庙，又称铁丝娘娘庙，庙内供奉明初高皇后马氏。’洪武八年(1375年)，来祥公邓钦与勇略将军郭有福为他们爱戴的马皇后(马秀英)建立祠堂，以后称新寨庙，别称马娘娘庙。马娘娘成了新寨村及邓家磨邓家的家神。洪武二十三年(1390年)，洮州番族叛乱，来祥公带兵征讨，因敌众我寡，战歿于岷州木寨岭，葬于哈达铺新寨河口。

来祥公邓钦的后代分布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(邓家磨)、庞家乡(楞梁、扎子口)、八力镇(隆家寺)、岷县麻子川镇上沟村，临潭县王旗镇磨沟村，和政县邓家庄、石虎家，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邓家村和湖南武冈等地。

· 峥嵘岁月 ·

追忆弦歌不辍的烽火激情年代

——西南联大旧址

□ 白英

万里长征，辞却了，五史宫阙。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戟植柝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弦诵在春城，情弥切。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继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寇寇复神京，还燕碣。

——西南联大校歌 冯友兰词《满江红》

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，是一所仅存在了8年多的大学。在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西南联大以它独特的方式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学子。这所曾经的中国顶级学府，虽然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但它的魅力却让人无法忘怀。

步入云南师大校园，绿草茵茵，树木参天，沿着联大路在一处教学楼右拐，便是西南联大的旧址。旧址大门，两根粗大的石柱支撑着中间一块横匾上写着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8个大字。穿过大门进入其内，草坪中是西南联大3位校长的半身石雕像，分别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。

1937年11月1日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3所高校南移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南京沦陷，长沙告急。为了让学校继续办下去，全校师生继续西迁，迁往远离前线且能保持对外畅通的昆明，于1938年4月更名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这3位校长组成了西南联大校常委会，共管西南联大。3位校长以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，谱写了一曲曲高扬



爱国主义精神、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时代赞歌。

在“一二·一”运动纪念广场，广场中间用青铜铸成的雕塑人物组成了“12·1”的字样，表现了学子们争取自由、反抗黑暗、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。1945年12月1日，国

民党反动派为镇压联大师生反对内战，追求和平民主的要求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·一惨案，1名教师和3名学生英勇牺牲。而后继以潘琰同学为代表的莘莘学子，依然敢于斗争，敢于献身，矢志追求光明。



循着旧址遗迹，可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柱等历史遗存。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，这块由冯友兰撰文、闻一多篆额、罗庸书丹的纪念碑被誉为当代“三绝碑”。碑座呈圆拱形，高约5米，宽约2.7米，中嵌石碑。碑文约1000余字，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。从1938年西迁入滇，历经八年烽火，西南联大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。为缅怀昆明八年支持之辛苦，纪念三校“为一体，如胶结；同艰难，共欢悦”的珍贵历史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6

年联大各校即将北返之际，校方决定“以此石，象坚节，纪嘉庆，千来哲”。同时为答谢云南人民的深情厚谊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整建制留滇，独立设置办学，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。

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舍，虽然由著名建筑师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建造而成，但由于条件限制，木门木窗十分简陋，除了图书馆的屋顶是青瓦，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是铁皮屋顶之外，其它建筑一律是茅草房。被保存下来的老教室，旧时原有的土坯墙面、纸面窗户和铁皮屋顶，因为历经风吹雨淋已做了修缮。其内部的黑板、椅子都是曾经西南联大学生真正用过的。颇有年代感的木椅右侧有扶手，扶手是一块形似云南名特产火腿的窄木板，联大学生把这种椅子叫“火腿凳”。

西南联大在短暂的8年时间里，先后有8000多人就读，毕业约4000人，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正道2位诺贝尔奖得主，邓稼先、赵九章等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，黄昆、刘东生、叶笃正、吴征镒等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宋平、彭佩云、王汉斌等多位国家领导人，以及100多名人文大师、174名两院院士以及无数各行各业的栋梁人才。

来瞻仰、缅怀旧址，纪念联大师生，是对抗战烽火中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，更是对艰难困苦中刚毅坚卓的伟大精神致敬。